

数风流人物

——谈大型广播剧《情缘·毛泽东与诸暨》人物塑造

黄同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编剧赵卫明和他的“三驾马车”团队又有新作告成:革命历史题材广播剧剧本《情缘——毛泽东与诸暨》(以下简称《情缘》)。剧中重点塑造了伟人毛泽东和诸暨最早一批共产党人,他们是为建立新中国做出重要贡献、又鲜为人知的革命先驱。剧本洋洋数万言,连续六集,人物事件众多,活动空间遍及九省(市)城乡,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内涵丰富,可谓鸿篇巨制。

就大端而言,剧作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主题把握、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艺术语言运用等多个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笔者不揣鄙陋,仅就剧中人物塑造妄提拙见,就教于方家。

一、刻画众多人物 还原“心灵真实”

艺术思想是一部广播剧的灵魂,人物则是承载思想的载体,也是审美过程中创作与接受的主体。那么,作者创作这

部广播剧刻画众多的人物,真正用意何在呢?这是我在欣赏这部广播剧的过程中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一部戏剧的艺术思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要把一部戏剧的思想表达出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这又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剧,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科普”曾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因为一切真实的东西不见得都是艺术;艺术就其本质来说,是需要高超的虚构,在于把虚构的东西进行重构,变成艺术的“真实”。记得黑格尔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最高的真实是心灵的真实”。包括广播剧在内的一切戏剧艺术,其最高法则是创造美,表现人物的心灵之美。作者在《情缘》剧本中对人物形象塑造,不管是伟人毛泽东,还是其他革命家,都着重刻画他们在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真挚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之美。我

想作者创作广播剧《情缘》,其真正用意可能就在于此。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众多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和广播剧中所塑造的毛泽东形象,有比较成功的,也有不甚理想的。其中存在的主要偏差有两个,一个是太注重宏大叙事,空洞图解导致了单一政治化说教,形象刻板僵化,多的是“高大上”,少的是人情味,让人只能高山仰止;二是缺乏对人物灵魂和情感的立体呈现,使人无法感受到人物真实的思想情感,难以引起心理共鸣,给审美带来障碍。显然,剧作《情缘》对这两个方面有了足够警惕,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为了克服空洞的宏大叙事,根据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作者设置了一系列历史场景、精彩情节,以及丰富饱满的细节。如,长沙郊外农家小院的家庭鸡宴、张秋人的“火牛阵”、上海外滩的恋情之夜、广州前街口“生动一课”、38号小楼接风家宴、钱希均与毛泽民到瑞金看

望毛泽东、张秋人在杭州壮烈牺牲、长征中的钱希均、钱之光山西购粮、毛泽民新疆被害、重庆谈判中毛泽东与钱之光夫妇拉家常、冯文彬与“平山经验”、毛泽东批示与“枫桥经验”诞生等等。作者采用蒙太奇手法，将一系列纷繁的历史“场景”，按照时代纵线次第展开，构成了一个紧密有序的宏大结构整体，在历史长度和空间拓展方面有了丰富的呈现，增强了历史的纵深感，并成为人物活动的广阔载体。人物成为场景和情节的主体，加强了叙事的时代气息与情感氛围，推动着剧情向前发展，叙事视角在人物和情节之间不断转换，逻辑清晰，环环相扣，跌宕起伏，使故事呈现线性结构。因此，剧作呈现出一种枝繁叶茂、形态井然的历史气象与浓烈的历史氛围。

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剧作把重大历史事件，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形成的第一次工农运动高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反围剿、长征，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后来的重庆谈判，解放战争及土地改革等等都推到背后，作为历史背景处理；与人物关系不大的历史背景予以虚化，把人物聚焦到台前作为重点刻画，做到虚实结合，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繁简相宜。

与其他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有所不同，《情缘》中的毛泽东既是中国革命的统帅，更是剧中巧妙设置的人物“统率”。经此突破，剧中的人物交往就变得交相辉映、水乳交融。置于多侧面、多视角透视之下，剧中的毛泽东作为普通人，有着丰富情感和内心世界，他与诸暨老一辈革命家深厚的同志之情、战友之情，与钱希均的亲

情，与毛岸英等三个儿子的父子之情，与杨开慧的夫妻之情，与毛泽民的手足之情，奠定了塑造毛泽东形象成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同张秋人志同道合，结为莫逆。张秋人视毛泽东为良师益友，毛泽东对张秋人关爱有加，赞赏“他是个好同志……我忘不了他呀。”得知秋人牺牲，“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思念秋人彻夜未眠，烟头扔了一地。以茶代酒，亲自祭奠秋人，可见他对秋人的感情之深。毛泽东把钱之光、钱希均兄妹俩看作自己的亲人，当作一家人看待，喜欢同他们一起聊家常。对他们说：“我们是亲戚”“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对他们叫他毛委员或主席，认为是“太见外了！”他高兴他们叫他大哥。这样的毛泽东形象，无形中拉近了与人们的距离。穿越时代，这种真挚愈发闪光为当下普通人所理解和接受，极易在思想情感上产生共鸣。

由此可见，作者在“情”字上大写人情，革命历史剧不再到处是滚滚硝烟的战场，那些战场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同样生动感人。

二、塑造革命人物 展示普通人情怀

人情不是无本之本，革命者的感情源于共同的信念，一样的奋斗。

在展示伟人毛泽东普通人情怀的同时，剧本对诸暨老一辈革命家的塑造，借助与毛泽东的交往联系，使得故事紧凑、情感丰富。对张秋人的刻画，主要通过毛泽东领导下组织湖南矿工罢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毛泽东一起办《政治周刊》等革命活动，表现张秋人与毛泽东兄弟般的情谊，与

工农大众的深厚感情，以及坚定的革命活动家的形象。对钱希均的刻画，主要通过毛泽民恋爱结婚，与毛泽东的交往共事，表现她对丈夫、对毛泽东、对同志的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她把毛泽东三个儿子看作自己的儿子，体现出大爱和责任担当的美德。该剧把她塑造成一位美丽温柔而又坚强的巾帼英雄。

张秋人把钱之光、钱希均兄妹俩领上革命道路。剧本介绍钱之光曾经三次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革命，通过三次活动，表现钱之光对毛泽东、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以及杰出的组织才能和缜密的工作作风。

被毛泽东称为“红小鬼”“诸暨秀才”的冯文彬，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往。在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等多次战役，后主要主持党的青年工作，在党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兼任平山县委书记，在西柏坡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小组。剧作重点讲述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创造性地开展土改，用党内外结合的方法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并把他的土改中的做法升华为“平山经验”，对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倾向起了很好的作用。剧本把他塑造成一位文武兼备、善于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革命家。

三、塑造人物形象 尊重史实虚构“真实”

剧作对人物形象塑造，正确处理了纪实与虚构的关系。

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书中认为，“历史剧既应虚构，亦应遵守史实；虚构而外的事实，应尽量遵照历史，不宜

随便改动。”^①矛盾提出的“历史剧既应虚构,亦应遵守史实”的原则,同样适用于革命历史题材剧。剧本《情缘》很好地处理了虚构与史实二者之间的关系,既尊重史实,又有虚构内容。

尊重史实方面,主要体现在大事不虚,真实地叙述历史事实,不虚构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均符合史实。

出于塑造人物和叙事需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明显地运用了艺术虚构手法,通过审美过程中的艺术想象,大胆合理地虚构了一些内容。如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细枝末节、具体的场景、人物之间的对话等,虚构了文明办新进科员肖盈、市委宣传部郭部长、湖南炮兵连覃连长、黄埔军校反动学生高福魁、反动地主王禄子、“枫桥经验”相关人员徐大根、王小翠、钟成炎、馆长、讲解员,另有学生、农民、矿工、炮兵、红军、农讲所学员、黄埔军校生、狱卒、服务员、民兵等。

戏剧家毕竟不是历史家,其任务不是再现真实的历史,展示历史真实不是他们的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切戏剧艺术是没有真正的“真实”的,照搬照抄历史、革命历史,实际上不是艺术,也非审美。不具备较高的艺术性,就不成其为艺术作品。戏剧艺术就其本质来说,是需要艺术虚构的,剧作家的作品首先就是这些东西,并把虚构的东西变成艺术的“真实”。一个剧本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造诣主要体现在虚构的“真实”上。

革命历史题材剧较之一般历史剧,在艺术虚构方面受到

的制约会更多,尽管如此,剧作《情缘》依然实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和谐统一,达到了一个较高的艺术审美层次。

四、营造“家”的氛围 让人物回归生活

出于对广播剧艺术特质的把握,剧本在多处通过营造“家”的氛围,让人物回归生活。“家”成为人物生活化的重要意象。1922年,张秋人来到长沙拜见毛泽东,剧本安排他们是在家庭氛围情境里见面的:长沙郊外清水塘畔农家小院,有抱窝的母鸡、劈柴的毛泽东、身怀六甲的杨开慧、有些嘴馋的毛泽民……

1926年春,张秋人赶赴广州和毛泽东一起办《政治周刊》,也是在家庭氛围情境里与大家见面的:在位于东山庙前西街的一幢粤式传统小楼里,杨开慧掌勺烧菜,早已摆好了简朴的接风宴,毛泽东、杨开慧、萧楚女、沈雁冰几乎望穿了双眼,等待张秋人的到来。张秋人来后,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很快动起了筷子,大家举杯为张秋人到任干杯,东山庙前西街小楼里碗盘叮铛,好不热闹。张秋人给大家带来香榧、同山烧等家乡特产,让大家品尝,还特意给开慧嫂子带来家乡火腿让她补身子。大家边吃边聊,欢声笑语不断,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情趣和积极乐观的革命情怀。

在生活化的氛围中刻画的人物,使得剧作营造氛围,显得更真实和有生气。1931年七八月间,钱希均、毛泽民来到瑞金,与毛泽东见面后,毛泽东说:“泽民、希均,走,回家去”,回到毛泽东住处,通过三个人对话、钱希均为毛泽东理发等,再次创造“家”的意象,让人

感到家的温暖。对话中的兄弟情谊,生活情趣,尤其是毛泽东的幽默风趣,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剧作中,“家”意象的重复使用,除了对刻画人物、烘托主题起到强化作用外,似乎还有另外的喻义,革命队伍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大家要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与此同时,剧作对人物形象塑造显示出作者良好的文学功力,这主要体现在叙事过程中透出的“诗”性韵味。

诗歌是表达情感的文学艺术。剧作里“诗”性主要表现在:通过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纯洁的革命爱情,如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毛泽民与钱希均的爱情;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人物之间的情谊,如毛泽东与俞秀松、张秋人、钱希均、钱之光、冯文彬毛泽民等人之间的亲情、战友情、同志情;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味笔调,刻画了一群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人物形象;以普通人的视角,表现人物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以散文笔法、诗性的叙事对意境的营造,以加强抒情性,增强感染力等等。这些都使剧作具有了“诗”性的气质。

剧作的文学功力突出地表现在驾驭语言精心编写的人物台词。台词是塑造人物最重要的手段,也是一部广播剧最见功力的地方。《情缘》遵循广播剧听觉艺术规律,台词写得口语化和生活化,不仅交待剧中人和事的来龙去脉、人物的行动和目的,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其中几场重

头戏的台词都写得很精彩,有思想的高度和深度,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彰显了人物的思想之美、信仰之美、情感之美、崇高之美。

五、结语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一位前辈积几十年的探索实践,得出经验之谈。《情缘》以自己的创新,遵循着这一艺术规律。

当然,作为一个初稿,该作仍有不少可以提升的空间。譬如剧中的重庆谈判桥段,有些情节在多部影视剧中屡屡出现,缺乏新意;个别剧情(如毛泽东赋诗《沁园春》等)明显游离;特务行刺毛泽东又不符历史和逻辑……这些尚待剧作者在修改时注意及改进。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部史诗品质的剧作已经搭就了一个文本看台,期待着暨阳

优秀儿女以豪迈的风采,唱出一台好戏。剧本,乃一剧之本。我深信,有一个基础扎实的剧本,只要通力合作,一定能打造出一部精品力作,献礼建党一百周年。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①杨咏祁,《审美形态通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

2020·1

视听纵横

